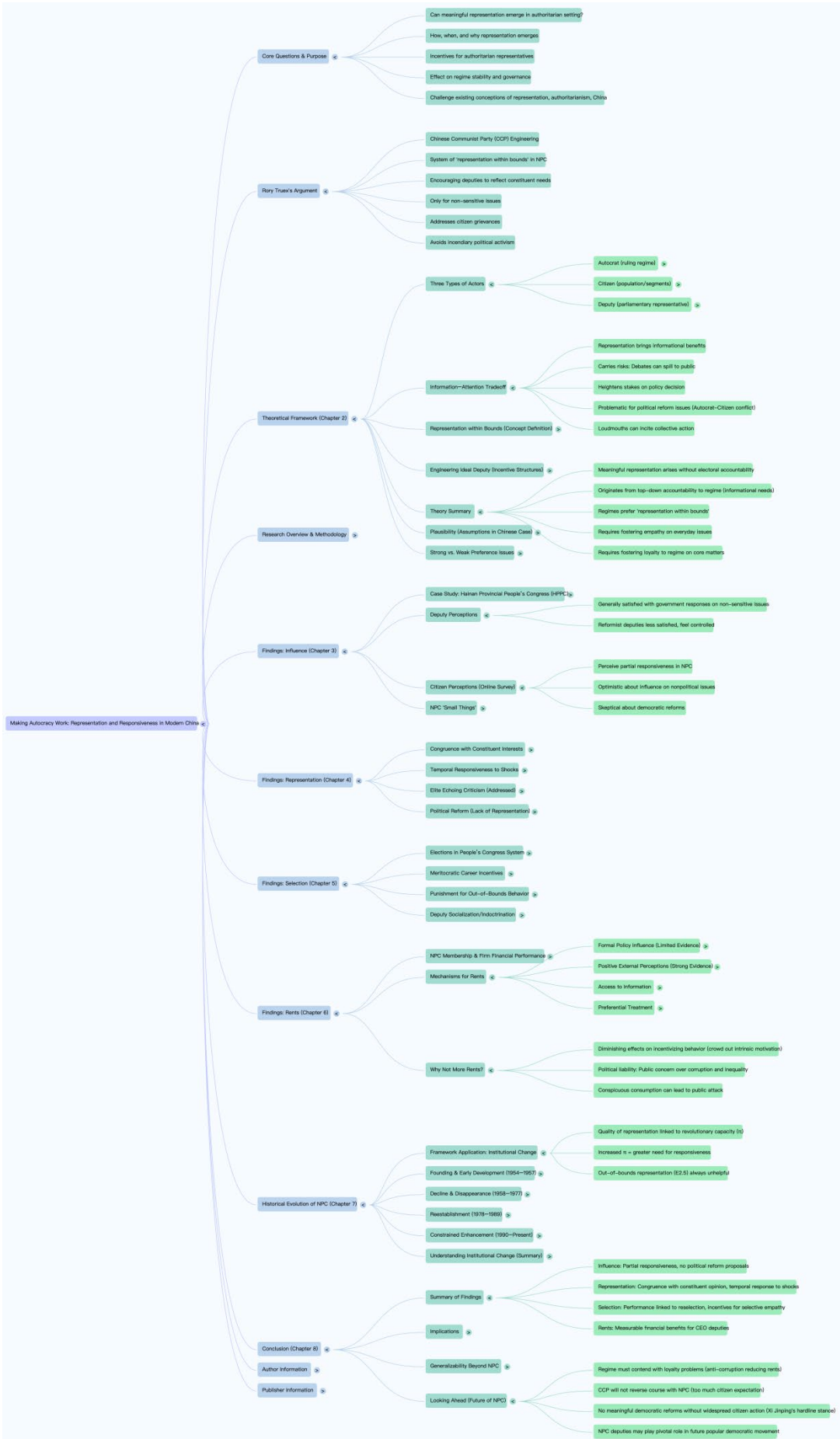


【文献引用】

Truex, Rory. 2016. *Making Autocracy Work: Representation and Responsiveness in Modern China*. 1st 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oi:10.1017/CBO9781316771785.



1. Introduction

罗里·特鲁埃克斯所著《让专制发挥作用》的“引言”一章开篇就强调了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NPC）是一个“橡皮图章”机构，由于其缺乏真正的选举问责制，且一贯赞同中央领导的立法举措，与中国社会基本脱节。尽管人们普遍认为，有意义的代表制需要民主，但该章指出，许多人大代表积极努力地打破这种不良声誉，其中一些人广泛地接触选民，甚至声称比西方同行更具响应能力。这种对比引出了本书的核心问题：**在威权体制下，是否能够出现有意义的代表制？它是如何以及为何出现的？在没有选举问责制的情况下，威权代表面临哪些激励机制？以及代表如何影响政权稳定和治理？【本书的问题意识】**

随后，该章探讨了议会的更广泛用途，指出自1960年以来，**全球约有46%的国家处于威权政体之下，并设有某种形式的议会，这表明这些机构并非仅仅是“装点门面”。【比较政治学的视野】**现有的威权议会理论通常侧重于**合作**（安抚反对派）或**权力分享**（在执政联盟中分配资源）。然而，特鲁埃克斯认为，这两种框架都无法完全解释中国的案例，因为**中国缺乏统一的反对派，而且精英内部的谈判主要发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高层机构中**。作者承认，现有的微观研究显示存在一些立法活动，但指出需要一个全面的框架来解释立法者、政权和选民面临的激励与权衡，并对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特鲁埃克斯提出了自己的框架，该框架包含三个参与者：独裁者、副手和公民。其核心思想是“**信息-注意力权衡**”（Information-Attention Trade-off）。**独裁者**（代表执政政权）需要了解公民的偏好，以维持权力并避免代价高昂的革命，因为信息不完整可能会危及政权的存亡。**议会代表，即副手，可以通过传达公民的不满情绪来充当“抗议者”，从而减少信息不确定性，促进响应式的政策制定，正如中国全国人大提案、越南的质询会以及摩洛哥的实况调查团所见。**然而，这种信息披露也存在风险：公开讨论可能会增强公民对某个议题的兴趣，尤其是在独裁者和公民的偏好发生冲突的敏感政治改革方面，这可能导致不稳定或不必要的让步。**【本书所见信息问题】**

这引出了“界限内的代表”的概念，它被定义为一种行为模式，即**威权主义的议会代表在非敏感问题上反映选民的利益，但在对威权国家敏感的问题上保持沉默**。理想的代表能够在非政治问题上表达公民的偏好，同时对民主改革的诉求保持沉默，从而使独裁者能够做出回应，并将集体行动的风险降至最低。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独裁者可以运用两种手段：培养代表的“选择性同理心”（他们在政治上保持冷漠，但在日常问题上却能体察民意）；以及提供私人“租金”（任职期间的福利），以鼓励忠诚并抑制改革冲动，将代表的既得利益与政治体系的生存联系起来。**该理论的结论是，**有意义的威权代表制并非自下而上，而是源于受政权信息需求驱动的自上而下的问责制，并通过培养选择性同理心和忠诚度来确保“在合理范围内的代表制”。**这一独特的预测使其有别于“最低限度代表制”（表面功利、权力分享的观点）和“充分代表制”（合作理论）。

本章随后概述了本书的研究范围，重点是在中国全国人大中检验这些影响，承认中国国土面积的非典型性，但也注意到其常见的威权主义议会特征（非竞争性、平民制、一党制）。本书的目标是展示该框架对中国全国人大的解释力，并希望其洞见能够适用于其他威权主义体制。实证研究方法结合了关于代表背景和行为的原始数据集、调查、访谈以及全国人大文件，同时也承认在如此敏感的语境下数据本身的局限性。本书的结构详尽，概述了后续章节将如何探讨该理论的可观察影响：将代表提案纳入政策（第三章）、代表表现出“限度代表”的行为（第四章）、激励选择性同理心的制度（第五章）以及以租金奖励代表的制度（第六章）。第七章将阐述全国人大从历史演变到目前的均衡状态，第八章将讨论该框架的普遍性和中国政府的未来。

最后，作者探讨了其贡献，并将其与罗伯特·普特南的《让民主发挥作用》进行了类比。他的主要目标是论证**威权代表制的存在，表明即使没有自由选举，代表也能发展出“与人民的亲密友谊”，并能够在广泛的非政治问题上表达选民的利益**。本书提供了新的实证设计和发现，包括立法者与选民之间一致性的证据、政府对立法理念的采纳、代表的职业激励和经济利益，这些在威权政治领域堪称“首创”。从理论和概念上看，信息与注意力的权衡（信息的收益，对敏感问题高度关注的成本）不仅局限于议会，也延伸到威权政体中的其他公共信息交流领域，例如媒体和抗议活动，这些领域也表现出有限的动态。更广泛的论点表明，**响应式治理并非民主国家独有**；像中国这样的威权政权可以收集信息、提供公共物品并维持公众支持，而全国人大这样的咨询机构对于威权政治的运作至关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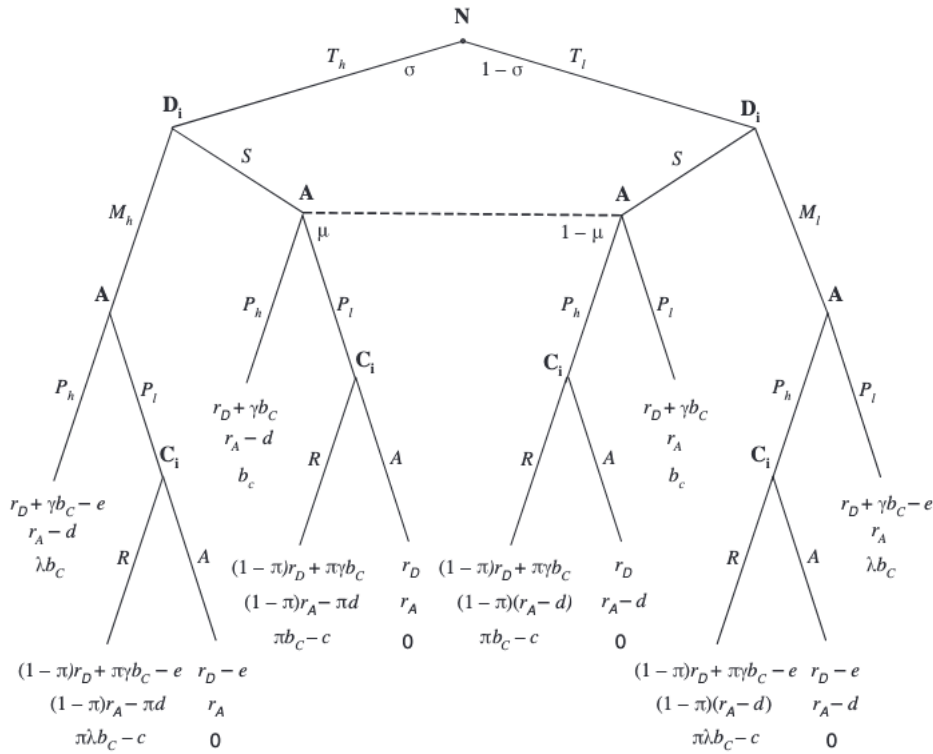
2. A Theory of Authoritarian Representation

“威权代表理论”一章首先阐述了本书的核心问题，即在威权体制下能否出现有意义的代表制，如果可以，那么如何、何时以及为何出现。该章节认为，尽管许多观察家将中国全国人大代表斥为“五音不全”（Tone-Deaf）或“橡皮图章”（Rubber Stamp），但一些代表却声称他们能够回应选民的呼声。本章深入探讨了这种对比，探讨了**在缺乏真正的选举问责制的情况下，威权代表面临的激励机制，以及代表如何影响政权的稳定和治理**。本章还指出，威权政权定期召开立法会议，自1960年以来，全球约46%的国家/地区设有议会。

本章介绍了一个包含三个参与者的正式模型：**独裁者（代表执政政权）、公民（民众）和代表（议会代表）**。独裁者面临的根本困境是关于公民偏好的不完整信息，如果不加以解决，这可能导致政策不理想，并危及政权的生存。代表的作用是通过揭露公民的不满来减少这种信息不确定性，有效地充当民众的“谏言人”，正如中国全国人大代表提案或越南的质询会所体现的那样。

然而，这种代表制也存在固有风险。**公开辩论或传达信息可能会激起公民的兴趣，并提高政策决策的风险，尤其是在独裁者和公民的偏好相冲突的敏感问题上，这可能导致破坏稳定的集体行动**。该模型表明，代表制虽然提供了信息优势，但如果政权不愿回应，也会产生问题，从而导致不稳定。

鉴于这种信息与注意力之间的权衡，本章引入了**“界限内代表制”**（Representation within Bounds）的概念。这被定义为一种行为模式，即**威权主义的议会代表在广泛的非敏感问题（称为“弱偏好或无偏好问题”）上反映其选民的利益，但在威权主义国家核心的敏感问题（“强偏好问题”）上保持沉默**。**【信息选择的方案】**独裁者的理想结果是副手在非政治问题上传达公民的偏好，以便制定响应性的政策，但在独裁者不愿做出让步的问题上保持沉默。



这引出了本章的前两个命题及其可观察到的推论：

- ◆ 命题 1 指出，在**弱偏好或无偏好问题**上，独裁者将根据副手的信息调整政策决策，前提是公民能够可信地威胁革命。可观察到的推论是，**威权政体会将副手关于弱偏好或无偏好问题的提议纳入政策**。
- ◆ 命题 2 断言，当副手就弱偏好或无偏好问题传达信息时，独裁者的处境会更好，但更希望副手在**强偏好问题上保持沉默**。这导致了可观察到的推论，即稳定的威权议会中的副手应该表现出“在界限内代表”的行为。

为了实现这种特定的代表制，该理论指出了独裁者可以操纵代表的两个关键激励结构：**同理心和租金**。

- ◆ 命题 3 解释道，虽然**更高的代表同理心在无偏好问题上有利于独裁者的福利**，但在**强偏好问题上则可能有害**。因此，可观察到的启示是，政权将设计激励措施来培养“选择性同理心”，即代表在政治上保持冷漠，但在日常事务上却能关注民意。
- ◆ 命题 4 指出，**更高的代表租金（即其职位带来的收益）对独裁者的福利具有一致的正向影响**，因为这赋予了代表在政权存亡中**既得利益**。可观察到的启示是，政权将通过向代表奖励租金来培养忠诚度。这些租金通常是私人的、不可分割的利益，通常是财务性的。

本章随后评估了其核心假设在中国情境下的合理性。

- ◆ 关于信息假设，本文指出，**中国全国人大通过代表提案为中共政权提供有意义的信息，充当着“民意晴雨表”的角色**。虽然它并非唯一的信息来源，但却是一个重要且有效的渠道。
- ◆ 关于关注假设，本文认为，**代表提案确实能够引起公众兴趣，并提升议题的突出性**，例如围绕所得税起征点或独生子女政策的讨论。**【信息的塑造作用】**
- ◆ 可信威胁假设得到了百花齐放运动、民主墙和天安门广场抗议等历史事件的支持，这些

事件表明中共对潜在群体骚乱的担忧，以及其随后在镇压和应对机制方面的投入。

- ◆ 最后，鉴于中国的“9号文件”明确指出了对中共控制至关重要的“强烈偏好问题”（例如，西方宪政民主、普世价值、公民社会、媒体自由、历史虚无主义、质疑经济改革），政策偏好假设是合理的。其余政策领域被视为“弱偏好或无偏好”问题。

本章最后将其“界内代表制”框架与其他现有的威权议会理论进行了对比，这些理论包括：合作理论、权力分享框架、精英动员观点以及流行的“橡皮图章”概念。本章重点强调了其在代表制性质、代表影响力、代表遴选和租金存在等方面的预测差异。虽然本章承认全国人大可能融合了所有这些框架的元素，但其自身的框架为理解全国人大的关键动态提供了独特的解释力。

3. Does the NPC Matter?

TABLE 2.1 Comparison of Alternative Frameworks

Representation within bounds	Cooptation	Powersharing	Elite mobilization	Rubber stamp
<i>Function</i> To provide information and enable responsive policy making	To identify and coopt members of the opposition	To facilitate powersharing among the ruling coalition	To communicate preferences of elite government actors	To provide legitimacy to regime legislative initiatives
<i>Representation</i> Representation of constituent interests on nonsensitive issues	Representation of opposition interests	Minimal representative activity	Representation of elite official interests	Minimal representative activity
<i>Influence</i> Deputy influence limited to nonpolitical issues	High deputy influence	No clear prediction	No clear prediction	Minimal to no deputy influence
<i>Selection</i> Deputies selected for quality of representation and loyalty	Deputies selected for opposition and discontent	Deputies selected for factional ties	Deputies selected for opportunistic echoing	Deputies selected for loyalty
<i>Rents</i> Deputies receive rents to instill loyalty	Deputies receive rents to distribute to oppositional groups	Deputies receive rents to placate factions within regime	No clear prediction	Deputies receive minimal rents

“全国人大重要吗？”这一章开篇对比了人们对中国全国人大代表“听不进任何意见”或“橡皮图章”的普遍看法，以及一些代表声称对选民表达积极回应的案例。它引出了一个核心问题：**在威权体制下，是否能够存在有意义的代表制，以及代表如何影响政权的稳定和治理。**随后，本章详细介绍了活动人士雷闯的故事，她通过向全国人大代表提交提案，成功影响了有关乙肝歧视的政策，展现了在威权体制下解决公民申诉的情景。

这一叙事为“**部分回应性**”的概念奠定了基础，该概念认为，威权政权出于避免代价高昂的革命的需要，会**根据代表关于“弱偏好或无偏好问题”的信息调整政策**。然而，这种回应性明确地局限于**非敏感议题**，这与可能威胁政权存亡的政治改革呼声有所区别。本章旨在客观评估全国人大代表的政策提案的影响力，挑战普遍存在的“橡皮图章式”驳回。

为了提供背景信息，本章包含“全国人大 101”一节，概述了全国人大的正式宪法权力，例如修改宪法、制定法律和选举最高领导层。它还描述了全国人大的机构结构，包括全体会议、定期召开会议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及专门负责立法工作的专门委员会。尽管全国人大拥有这些正式权力，但文本澄清说，其权力往往被夸大，国务院通常权力更大，而中国共产党通过人事任命来实际控制全国人大，以确保其在全国人大中的绝对多数和忠诚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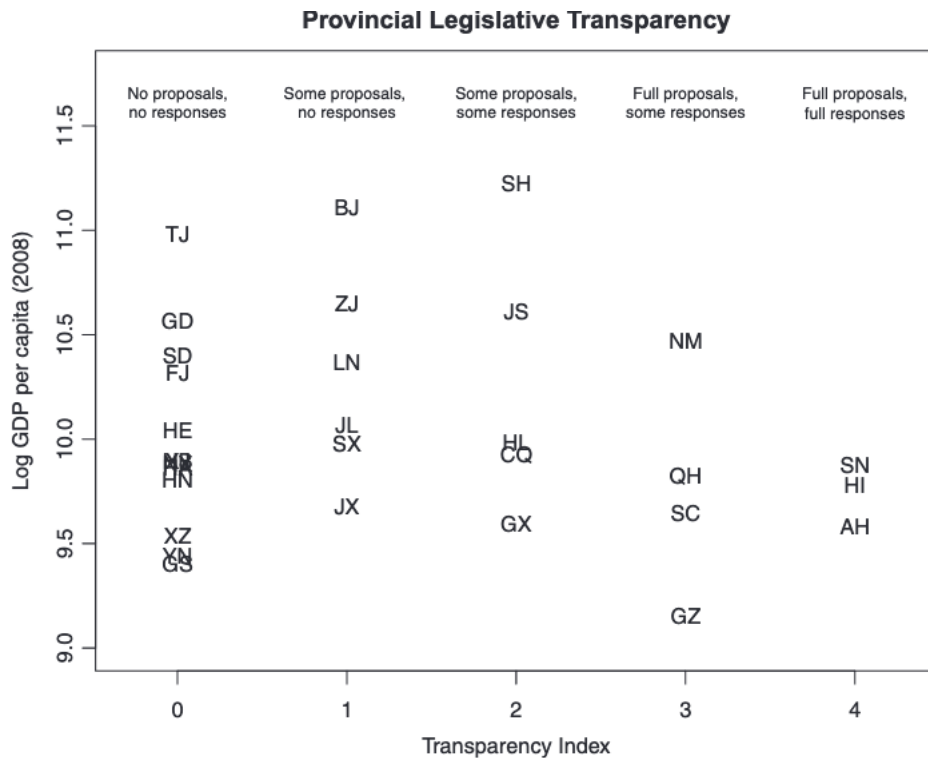
本章随后阐述了代表影响的三个主要渠道：

投票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象征意义，因为法案很少被否决，而且高层任命由中共预先确定。

参与草案会议使代表能够提出改进建议并审查法律草案，通常会修改其措辞和内容，这是一个重要的信息渠道。

政策提案流程（提案和动议）被认为是代表影响的最强渠道。每年提交数千份提案，经过分类，并收到政府部门的正式回复，通常在六个月内征求意见。官方统计数据表明，这些提案确实“已解决或已制定解决 76%问题的计划”，代表们对此满意度很高，尽管国家层面的透明度仍然有限。

这里有张图，展现了各省地方人大网站上的提案透明程度与人均 GDP 之间的关系。



本文以海南省为例，对这种部分响应性进行了实证检验。通过分析透明度极高的海南省人大代表的意见，**研究发现，在随机选取的提案子集中，约有一半似乎具有切实的政策影响力，包括对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项目（例如农民工文化建设）的重大投资。**至关重要的是，这些有影响力的提案均未涉及政治敏感问题，这进一步印证了“界内代表”理论。我们承认，仅凭这个可能更具响应性的省级案例进行概括存在局限性。

代表们的看法也证实了这一模式：**代表们通常对非敏感问题的答复表示满意，但对政治性提案持怀疑态度。**本章强调，代表们在这些非政治性提案上投入了大量精力，这表明这一过程并非仅仅是象征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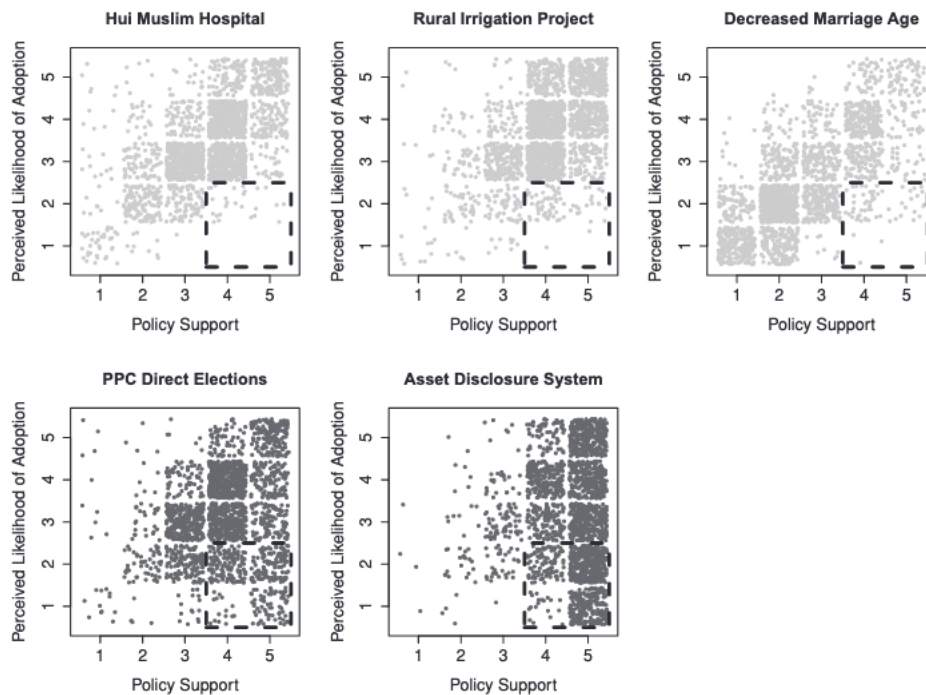


FIGURE 3.4 Citizen perceptions of the proposal process

最后，本章通过一项原创的在线调查，考察了公民的看法。这项调查显示，公民普遍认为政府的响应度存在部分差异：**非敏感议题（例如农村灌溉、少数民族医院）的政策获得了公众的高度支持，并被认为有可能被采纳。**然而，对于敏感议题（例如财产公开、直接选举），公民虽然强烈支持，但认为这些政策不太可能被采纳，这表明他们“预期未得到满足”。本章最后指出，虽然代表们在威权国家的宏观框架下可能只会影响“小事”，但从选民的角度来看，这些往往是重大事项，例如道路建设或医院资金。【可以用来写本科毕业论文中的议题问题】

4. Testing Representation

“代表性的检验”一章首先介绍了周洪宇，他是一位人大代表，因其积极倡导公民诉求（尤其是在教育改革方面），被称为“炮嘴周”或“打鸣的公鸡”。周洪宇通过其网站和其他调查研究积极与选民互动，将他们的诉求转化为政策建议，例如他成功推动了农村地区的免费义务教育。凭借其勤奋，他在人大中的地位也一路攀升。这一例子为本章的核心论点奠定了基础：周洪宇体现了“有界限的代表性”，**在非敏感问题上认真传达选民的需求，同时保持对政权的忠诚。**

TABLE 4.1 *Proposals and comments in the 11th NPC (2008–12)*

#	Topic name	<i>n</i>	%	Highest probability words
1	NPC session	137	4.4	peopl, year, congress, nation
2	Legal system/lawmaking	114	3.7	law, system, legal, right
3	Healthcare	144	4.6	medic, health, hospit, insur
4	Cultural protection/ minority issues	113	3.6	cultur, chines, nation, heritag
5	Education	207	6.7	educ, school, student, univers
6	Water conservation/ irrigation	79	2.5	water, river, conserv, construct
7	Development	302	9.7	develop, industri, econom, promot
8	Energy/emissions	104	3.4	energi, power, develop, industri
9	Taxation	115	3.7	incom, tax, increas, fund
10	Crime, order, and punishment	128	4.1	court, case, crimin, peopl
11	Housing	81	2.6	hous, afford, citi, price
12	Economic integration	118	3.8	develop, region, cooper, taiwan
13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61	2.0	drug, medicin, price, chines
14	Government/social stability	195	6.3	peopl, social, govern, public
15	Coal/steel industry	105	3.4	coal, industri, product, steel
16	Disaster prevention	108	3.5	year, disast, tourism, will
17	Internet management	102	3.3	inform, network, internet, children
18	Technology/innovation	135	4.3	technolog, innov, research, develop
19	Regional development	117	3.8	area, develop, region, forest
20	Agriculture/food safety	129	4.2	agricultur, food, product, safeti
21	Migrant workers/labor	117	3.8	worker, employ, migrant, labor
22	Rural interests	133	4.3	rural, farmer, villag, urban
23	Business environment	137	4.4	enterpris, market, financi, develop
24	National security/interests	56	1.8	servic, beij, said, olymp
25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67	2.2	protect, environment, environ, pollut
Total proposals and comments		3,104		

本章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实证研究，探讨人大代表的提案是否与民众的需求存在系统性的联系，重点关注人大代表是否在广泛的议题上反映选民的利益，而在政治敏感问题上保持沉默。本章旨在提供一些首批将威权立法者的行为与其所在选区关切进行比较的研究。为此，本章利用了两个主要数据集：**全国人大代表数据库（NPCDD）**，其中包含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2008-2012年）的个人背景信息、公开提案记录以及与政策相关的媒体评论；以及**中国调查**，这是一项具有全国代表性的2008年调查，用于评估各省级公众对各类社会议题的看法。使用潜在狄利克雷分配（LDA）模型，将代表的立法活动（特别是他们的提案）划分为25个议题领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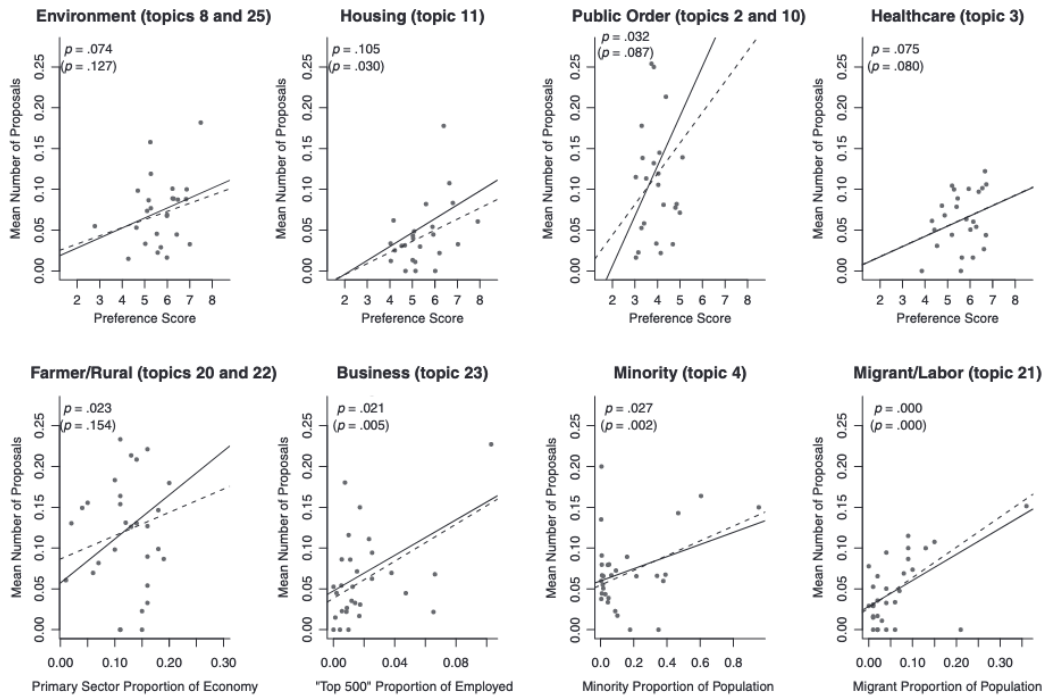


TABLE 4.2 Issue seriousness coefficient estimates ($\hat{\gamma}$)

	(1) Environment (Topics 8 and 25)	(2) Housing (Topic 11)	(3) Health (Topic 3)	(4) Order (Topics 2 and 10)
Issue seriousness (P_p) – Full MRP	0.136 (0.116)	0.426*** (0.102)	0.096 (0.138)	0.466*** (0.162)
Excl. professional covariates	0.129* (0.086)	0.409*** (0.102)	0.118 (0.139)	0.253* (0.163)
Excl. demographic covariates	0.175* (0.113)	0.437*** (0.102)	0.079 (0.134)	0.464*** (0.169)
Excl. all individual covariates	0.166* (0.106)	0.418*** (0.102)	0.098 (0.130)	0.264* (0.164)
Issue seriousness (P_p) – Trim MRP	0.124 (0.120)	0.456*** (0.106)	0.110 (0.147)	0.439*** (0.167)
Issue seriousness (P_p) – No Types MRP	0.142* (0.111)	0.348*** (0.112)	0.120 (0.138)	0.478*** (0.165)
Issue seriousness (P_p) – Disaggregated	0.121 (0.117)	0.269*** (0.123)	0.113 (0.136)	0.439*** (0.158)

TABLE 4.3 Group density coefficient estimates ($\hat{\gamma}$)

	(1) Farmer/rural (Topics 20 and 22)	(2) Business (Topic 23)	(3) Minority (Topic 4)	(4) Migrant/labor (Topic 21)
Group density (P_p)	1.814* (1.390)	9.135** (4.397)	0.653 (0.718)	3.399*** (1.106)
Excl. professional covariates	2.162* (1.338)	9.526** (4.505)	0.636 (0.713)	3.259*** (1.141)
Excl. demographic covariates	1.959* (1.322)	9.813*** (4.048)	0.921 (0.642)	4.732*** (1.213)
Excl. all individual covariates	2.192** (1.301)	10.434*** (3.880)	0.944 (0.627)	4.622*** (1.138)

随后，分析深入探讨了代表行为与选民利益之间的偏好一致性。本研究利用省级数据，发现即使观测值数量较少，八次回归分析中有七次发现，选民偏好得分（例如环境或住房问题的严重性）与每位代表的平均议题提案数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1]。这种一致性也体现在人口统计或群体密度指标上，例如一个省份的农民/农村居民、商界人士、少数民族群体和农民工的比例。例如，研究发现，来自上海的代表对商业环境发表评论的可能性大约是来自宁夏的代表的五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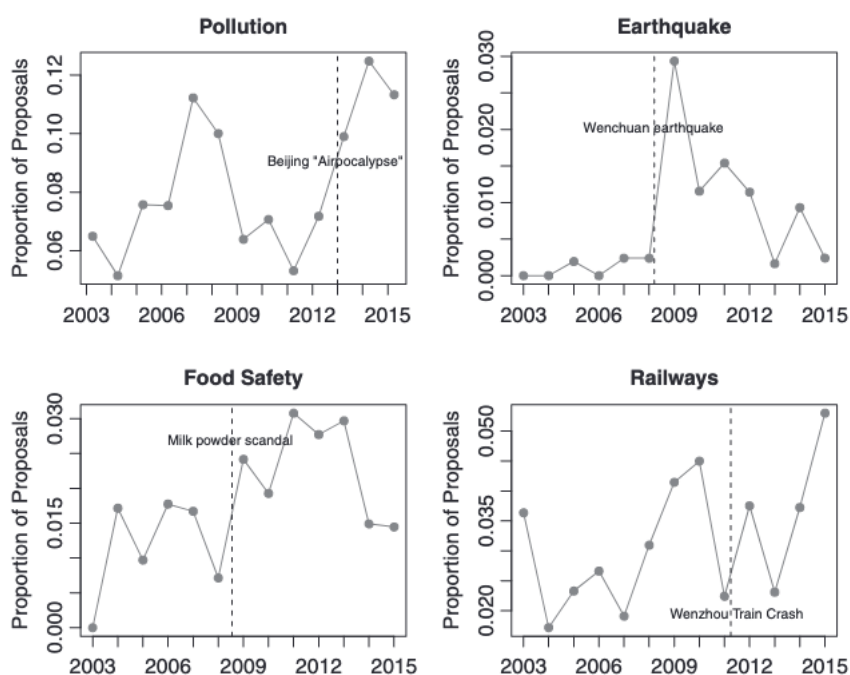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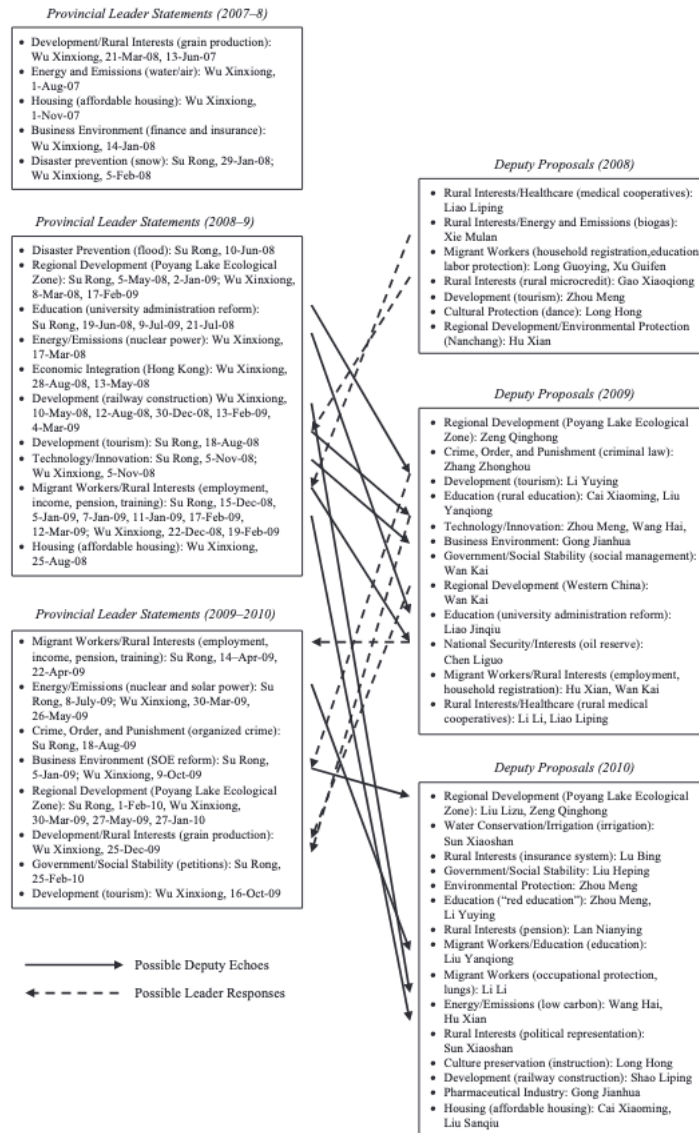


FIGURE 4.3 Exploring temporal variation – weak preference issues
Notes: The figure shows the proportion of proposals in each year that contain keywords relating to four governance shocks. All comments are drawn from the Oriprobe deputy database.

本章还探讨了代表行动主义的时变性。它考察了在 2008 年四川地震、2008 年三鹿奶粉丑闻、2011 年温州动车事故以及 2013 年北京“空气末日”等重大治理冲击之后，特定议题领域代表提案的比例是如何变化的。研究结果直观地表明，这些非敏感议题在中国社会获得公众关注后不久，人大代表们对这些议题的关注度便有所提升。

[1] 可以用来改高统的回音文章，加上人大相关的回归，而不是直接反映在政府工作报告上。

然而，至关重要是，**这种积极性仅限于非政治议题**。本章强调，腐败、村民选举和国内安全等议题虽然对政权来说较为敏感，但即使在备受关注的事件发生后，人大代表们也鲜有参与。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会议上，公开的提案中几乎没有（数据集中超过 3000 份提案中只有 45 份）提到“民主”，也没有一份提案呼吁自由的多党选举、放松互联网管制或言论自由，而这些正是一党制国家的核心利益。



本章随后探讨了其局限性和其他观点，特别是“精英动员观”。该观点认为，人大代表仅仅为了获得支持和晋升而附和党内精英，而非真正代表民众。为了反驳这一观点，本章以江西省为例，分析了 2008 年至 2010 年省长和省委书记的公开声明。**分析表明，绝大多数（75-80%）人大代表的提案并非仅仅附和领导层的声明，而且往往与精英层的优先事项存在很大差异。此外，人大代表有时会在问题上“引领”省级领导层，他们的评论先于官方声明，这与该理论的信息披露机制相一致^[2]。**

总而言之，本章断言，**在威权主义语境下，类似代表制的现象确实可能出现，但这种现象始终局限于特定议题领域**。虽然从国家层面来看，人大代表可能只会影响道路建设或医院资金等“小事”，但从选民的角度来看，这些往往是重大事项，这表明提案流程对非

^[2] 可以学习利用主题、时间将议题和回应追踪判断先后和回应联系的方法，在修改高统论文中非常有用。

敏感政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3]。代表们确实对选民对非敏感问题的要求做出了回应，并且这种行为与民众的需求有着系统的联系。

5. Getting Ahead

“迈进”一章以人大代表兼活动家许志永的引人注目的案例开篇。许志永最初因成功倡导将“人权”纳入宪法和改善农民工教育等议题而声名鹊起。然而，**当他开始推动政治敏感议题，例如谴责西藏的暴行和倡导政府支出透明化时，许志永的行动最终越过了红线，最终导致他被拘留、其组织被取缔，并失去了人大代表席位。**这一叙事为本章的核心主题奠定了基础：政权在其代表中“**选择性同理心**”（Selective Empathy）的运作。

核心论点源于理论框架的命题 3，即独裁者（执政政权）希望代表们在“弱偏好或无偏好议题”上体谅公民的偏好，但在威胁威权国家核心利益的“强偏好议题”上保持沉默。本章旨在检验中国共产党如何通过精英选拔程序和代表社会化或灌输来实现这种“有限度的代表性”。

为了理解选举过程，本章首先详细介绍了人民代表大会的间接选举制度，即由下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下一届代表，最终选举产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NPC）。虽然乡镇和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实行直接选举，但中共严格控制提名程序，确保约 70%的代表为党员，并满足特定的人口配额（民族、性别、党派）。**这导致议会在地理和人口结构上呈现多元化，但在政治上缺乏代表性。**

TABLE 5.3 *Proposals and career outcomes*

#	Variables for exact matching	12th NPC				12th NPCSC or spec. comm.			
		<i>prop[npc12=1] - [npc12=0]</i>				<i>prop[npcscsp=1] - [npcscsp=0]</i>			
		Full	CCP	Non CCP	Obs.	Full	CCP	Non CCP	Obs.
M1.	None	0.456*** (0.093)	0.645*** (0.114)	0.138 (0.153)	2,650	0.916*** (0.369)	1.128*** (0.448)	0.317 (0.614)	2,388
M2.	M1. + <i>del1:del35 + ethn1:ethn63 + party1:party10</i>	0.569*** (0.093)	0.699*** (0.117)	0.052 (0.129)	2,315	0.570*** (0.279)	0.605*** (0.381)	-0.442 (0.049)	1,161
M3.	M2. + <i>female + retireage + pind1:18 + puni1:8</i>	0.725*** (0.072)	0.759*** (0.096)	0.289*** (0.055)	1,318	0.802*** (0.058)	0.820*** (0.078)	0.100*** (0.005)	199
M4.	M3. + <i>ccpcc + govrank1:4</i>	0.549*** (0.066)	0.569*** (0.087)	0.349*** (0.055)	1,019	0.559*** (0.022)	0.563*** (0.029)	NA NA	61
M5.	M4. + <i>npc8 + npc9 + npc10 + npcsc1:9 + npcsc9 + npcsc10 + npcsc11</i>	0.353*** (0.054)	0.361*** (0.072)	0.258*** (0.044)	620	NA NA	NA NA	NA NA	

Note: The table shows results of difference of means for *proposals* comparing 11th NPC deputies who did and did not gain membership in the 12th NPC, and 11th NPC deputies without committee membership who did and did not gain membership in the 12th NPCSC or Special Committees. The data are preprocessed using exact matching to account for the influence of quotas, status, and other factors. Standard errors are shown in parentheses. * $p < 0.10$, ** $p < 0.05$, *** $p < 0.01$.

随后，实证分析利用全国人大代表数据库（NPCDD）探究了代表的职业激励机制。通过比较十二届（2013-2017 年）连任的代表与未连任的代表，在通过精确匹配控制了各种人口统计学和职业特征后，研究发现，**连任十二届代表的代表在第十一届（2008-2012 年）的数据集中拥有的公开提案数量比前者多出约 20% 至 50%**。具体而言，每多提交一份提案，其连任概率就会增加约 2%。这种正相关关系也适用于晋升至颇具影响力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人大常委会）或其专门委员会的代表。相反，那些“越界”并挑战政权核心利益的代表则会受到纪律处分，例如许志永案和百花齐放等历史案例。

除了这些“硬性”的职业激励措施外，本章还探讨了通过人大代表培训课程进行社会化和思想灌输的作用。这些强制性培训课程通常持续数天，旨在指导新人大代表履行职责，强调联系群众、反映民意，但至关重要，它们也强调维护党的利益。高层领导在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强调了对党的忠诚，并提醒他们警惕采取多党民主或其他可能挑战中共领导地位的

[3] 信息的主题在不同人的眼中具有不同的显著性（Salience）。

制度。代表们表示，这些培训课程培养了他们对选民和党的强烈“责任感、义务感和责任感”。

在谈到局限性时，本章承认存在“精英动员论”，该论调认为人大代表仅仅为了晋升而附和党内精英的意见。然而，对江西省领导层声明和人大代表提案的案例研究表明，大多数（75-80%）人大代表提案并非仅仅附和精英的优先事项，而且人大代表的评论通常先于官方声明，这与该理论的“信息披露机制”相符^[4]。该章还重申，公开的提案非常少，十一届全国人大收到的 3000 多份提案中只有 45 份提到了“民主”，而且没有一份提案呼吁进行自由选举或放松互联网管制等根本性的政治改革。

本章最后以 2014 年香港“雨伞革命”为例，作为当代案例。尽管争取普选的抗议活动规模巨大，但全国人大代表并未公开发表声明支持“占中”运动，反而签署了支持警方镇压的决议。即使是表面上代表香港市民的代表，在高度敏感的政治议题上也缺乏倡导，这进一步强化了本章的核心结论：全国人大代表的代表性始终“在合理范围内”，在忠实于政权核心利益的同时，也认真处理非敏感的选民需求^[5]。

6. The Returns to Office

“重返政坛”一章以地产大亨黄玉彪试图行贿进入湖南省人大代表的轶事开篇。尽管他花了 32 万元人民币，却未能获得席位，这凸显了此类职位的可感知价值，并促使他揭露了贿赂丑闻。这一事件引出了本章的核心主题：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NPC）在内的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的席位具有重大价值。

本章的核心论点基于理论框架的命题 4，即**独裁者（即执政政权）更希望代表享有更高的租金（rD），因为这些租金对独裁者的福利具有一致的正向影响，能够鼓励忠诚，并使代表的激励机制与政权保持一致**。这些租金激励代表们积极地表达对非敏感问题的民怨，同时对威胁政权核心利益的政治敏感问题保持沉默。这一机制对于实现“有界代表性”至关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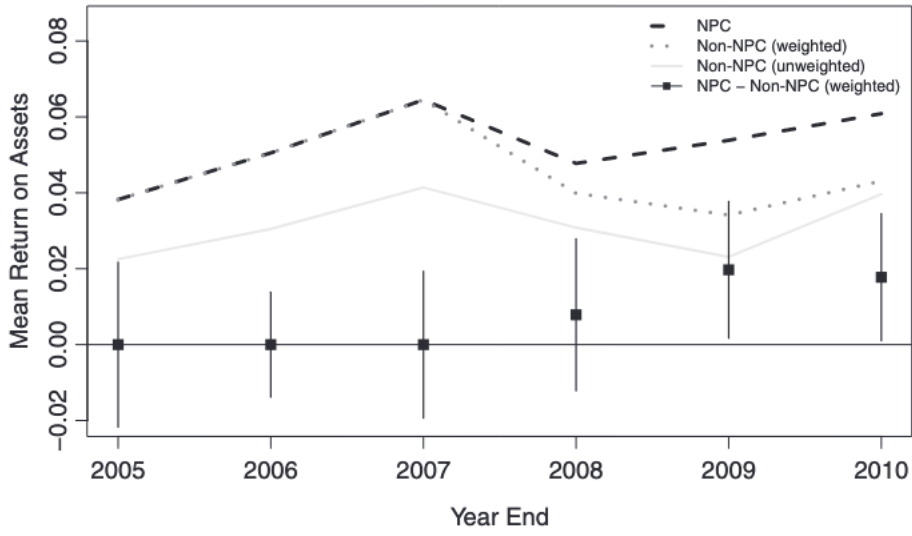
为了对此进行实证检验，本章使用了**其首席执行官兼任全国人大代表的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尽管承认将这一特定群体推广至所有全国人大代表存在困难，但鉴于数据可用性的挑战，这种方法被认为是最佳解决方案。该方法采用固定效应设计并结合熵平衡法，创建一个可比的**非全国人大公司对照组**，这些公司在处理前的财务特征和发展轨迹上与全国人大代表公司相匹配^[6]。这种严格的方法旨在分离“全国人大效应”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4] 可以为群众留言和人大提案之间建立联系，然后再去讨论人大提案和政府工作报告之间的联系。

^[5] 可以认为人大或政协起到了聚焦注意力和信息筛选的作用。

^[6] 感觉反向因果的可能性更大啊。

NPC Membership and Return on Assets



NPC Membership and Operating Profit Marg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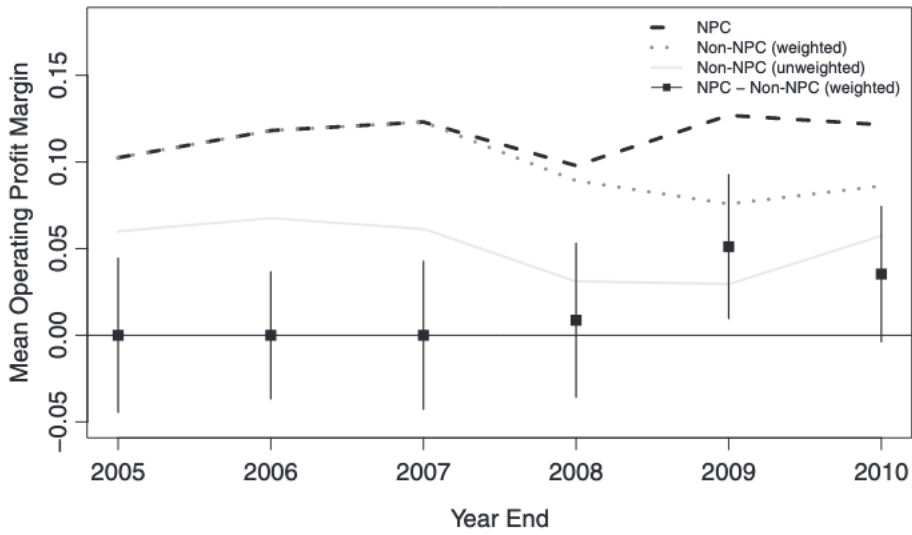


TABLE 6.2 *Fixed-effect estimates and robustness checks*

#	Variables for entropy balancing	roa		margin	
		2005–10	2007–9	2005–10	2007–9
M1.	<i>price</i> + <i>roa07</i> + <i>margin07</i> + <i>rev07</i>	0.017** (0.007)	0.017* (0.009)	0.030** (0.013)	0.040** (0.012)
M2.	M1. + <i>roa06</i> + <i>roa05</i> + <i>margin06</i> <i>margin05</i> + <i>rev06</i> + <i>rev05</i>	0.016*** (0.005)	0.015** (0.007)	0.034*** (0.010)	0.034*** (0.011)
M3.	M2. + <i>ind1:ind65</i> + <i>soportion</i> + <i>debratio07</i>	0.014** (0.006)	0.013* (0.007)	0.031*** (0.011)	0.030** (0.012)
M4.	M3. + <i>shares07</i> + <i>taxes07</i> + <i>firmage</i>	0.015** (0.006)	0.013* (0.007)	0.031*** (0.011)	0.029** (0.013)

Note: The table shows results of entropy-weighted fixed-effect regressions of different financial indicators on the NPC representation indicator. The table explores robustness across four different balancing models and two different analysis periods. Robust standard errors clustered at the firm level are shown in parentheses. M4 is the “baseline specification” referred to throughout the chapter. * $p < 0.10$, ** $p < 0.05$, *** $p < 0.01$.

实证分析表明，人大代表的任职资格可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研究发现，在人大代表席位中，企业资产回报率 (ROA) 可额外提升 1.5 至 2 个百分点，营业利润率可提升 3 至 4 个百分点。这些效益对小型私营企业尤为显著，而对大型国有企业 (SOE) 的影响则微乎其微。此外，对股价的分析表明，在首席执行官人大代表宣布当选后的几周内，公司股价会上涨 3 至 4 元人民币，这表明这些效益甚至在代表正式就任之前就已经显现。

本章随后深入探讨了这些经济效益实现的机制：

1. **正式政策影响**：虽然首席执行官人大代表的提案往往侧重于与其行业相关的经济问题（例如能源、技术、商业环境），但由于代表们不愿为狭隘利益进行游说，因此他们对企业层面政策的直接影响有限。然而，一些人大代表会策略性地提出一些提案，间接使公司受益，例如倡导全行业补贴或有利于其高端产品的药品采购改革。

2. **积极的外部认知（信号传递）**：这似乎是一种主要机制。人大代表资格可以向外部人士发出强有力的信号，表明一家公司管理良好、地位显赫，并拥有宝贵的政府关系。这一信号可以促进投资，鼓励业务往来，并增强公众对公司的信心，这一点已从股价走势和金融分析师访谈中得到证实。

3. **获取信息**：人大代表处于政府政策制定的核心，可以提前了解政府的优先事项和未来政策方向，从而使其公司能够主动调整业务实践。【从政府向社会 / 市场传递的信息】

4. **优惠待遇**：人大代表资格可以带来优惠待遇，例如更容易从国家银行获得信贷以及免受政府干预。

本章的结论是，对于拥有 CEO 的人大代表的公司而言，其任职回报是可衡量的、非同小可的。虽然很难通过实证研究证实其是否适用于非 CEO 人大代表，但坊间证据表明，地位较低的人大代表可能从声誉提升中获益更多，从而获得更大的优势。这些发现与“界内代表”框架相符，尽管其他理论，例如拉拢和权力分享，也预测了租金分配。最后，本章探讨了为何政权无法提供更多租金：**首先，过度的外部奖励会“挤出”公共服务的内在动机；其次，由于公众对腐败和不平等的担忧，过于显眼的租金可能会成为政治负担^[7]。**

[7] 显眼的政治租金何时会成为政治负担？外部奖励何时会过度到挤出公共服务动机？

7. The Evolution of the NPC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演变”一章旨在探索和解释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NPC）的历史发展，并运用第二章提出的理论框架来解读其制度变迁。其核心论点是，**独裁者（执政政权）的理想代表水平取决于民众革命成功的概率（ π ）。当革命成功概率较低时，独裁者可以忍耐度极低甚至不予回应；然而，随着革命威胁的上升，代表们在“弱偏好或无偏好问题”上表达公民偏好的需求变得更加迫切，以实现稳定^[8]**。至关重要的是，该理论认为，在所有问题上，尤其是在挑战政权核心利益的“强偏好问题”上，实现充分代表，对威权国家来说并非理想结果。该框架表明，威权议会的制度变迁发生在公民革命能力增强（导致代表权增强）或代表超越其权限（导致措施受限）时。本章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历史分为四个时期，以阐明这些动态。

建国初期（1954-1957年）全国人大正式成立，并拥有宪法赋予的重大权力，尽管代表们明白其对中国共产党的服从。选举过程强调政治忠诚，领导职位也由党内精英把持。尽管如此，早期代表们谨慎地承担起代表角色，就社会和经济问题（但并非政治上具有争议性的问题）进行调查并提交建议，这预示着在党的领导层关注下，在有限范围内实行“有界代表”行为的先兆。

这种试探性的发展在1957年百花齐放运动引发的衰落与消失时期（1958-1977）戛然而止。在此期间，思想自由的代表敢于批评党，并要求政治改革，理论框架将其定义为“强偏好问题”，引发了不必要的公民关注。政权将此视为威胁，迅速镇压了这场运动，处分了持不同意见的代表，并从根本上改变了全国人大。人大成员从知识分子转向了党的忠诚分子，全国人大的规模迅速膨胀，其年度全体会议也转移到了一个与辩论格格不入的大厅。代表活动实际上消失了，代表们被降格为动员者的角色——解释党的政策，而不是传达公民的诉求。这一时期的特征是稳定的无响应平衡（E1.1），全国人大被边缘化或非正式解散，这反映了毛泽东不容置疑的权威，以及尽管普遍存在治理失败，但民众对革命的可信度较低。

在邓小平领导下的重建时期（1978-1989），全国人大焕然一新。邓小平试图以法治取代政令，并恢复各机构的活力。1982年宪法和全国人大组织法恢复并扩大了全国人大的权力，允许代表联名提出动议，将直接选举扩大到县级，并规定候选人人数超过议席数。代表获得了新的权利，包括对发言和投票的一些法律保护，全国人大常委会成为一个专职机构。中共的席位份额下降，代表的受教育程度提高，导致代表和监督活动增加，包括异议投票和视察。提案流程焕然一新，社会和经济议题的“服务响应度”和“分配响应度”有所提升。然而，这种提升并不足以阻止1989年活动的发生。这一行动类似于诱发性不稳定无响应均衡（E2.5），表明代表们正在“越界”，积极煽动革命，迫使政权采取更多措施来确保稳定。

受限制的提升（1990年至今）始于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共汲取了社会分裂和公民期望不断上升的教训。当局的应对措施是清除胡绩伟等“麻烦制造者”，并提高中共党员在全国人大中的代表比例，以控制议会。与此同时，中共通过2000年《立法法》等法律增强了全国人大在政策制定中的作用。该法扩大了全国人大的权力，并要求法律草案经过多次讨论。新政策鼓励人大代表更加认真地履行职责，增加了支持人员和培训课程，从而促进了代表活动的活跃，提案的数量和质量也都有所提高。尽管有这些改进，中共仍保持着严格的控制，确保立法结果与党的领导保持一致，并避免进行诸如高层直接选举或允许候选人参选等根本性的民主改革。这一时期标志着“有界代表制”制度的制度化，全国人大成为一个“温顺但有用的议会”，在保持对中共忠诚的同时，就非敏感问题传达民意。

本章总结道，可以通过“关键时刻”（1957年的百花齐放运动及其后果、1982年宪法的通过以及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抗议及其后果）来理解全国人大的演变。这些时刻代表着

^[8] 这也恰恰说明在绩效下滑时期强调回应性的原因，因为概率会升高。

民众革命能力的转变，这影响了中共关于全国人大角色的决定。毛泽东之所以决定解散全国人大，是因为民众缺乏可信的革命威胁，使得该机构变得没有必要。邓小平逐步恢复全国人大以及天安门事件后全国人大的强化，则源于民众日益增长的不满，以及政权需要建立一个“反应迅速但有界的议会”来确保稳定。该理论框架承认个别领导人和权力斗争的影响，但强调威权统治者应对感知到的威胁，其反应是可预见的，即强化全国人大，以在某些议题上提升代表性，并灌输忠诚度，以阻止在其他议题上出现激进主义。展望未来，预计该制度将继续受到限制地强化，因为中共在反腐运动中面临着忠诚度问题，但不太可能扭转全国人大日益强化的作用。然而，如果没有广泛的公民集体行动，有意义的民主改革就不太可能实现，而在这种情况下，全国人大代表可以发挥关键作用。

8. Conclusion

“结论”一章首先总结了本书关于威权体制下代表制和立法机构本质的核心发现，尤其关注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NPC）。该章节认为，**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样的威权议会，通过揭露公民的不满情绪，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信息传递作用，但这也伴随着在敏感政治问题上产生不必要的曝光风险。**核心论点是，中国共产党积极构建了一套“有界代表”制度。该制度鼓励代表在非敏感问题上表达选民的利益，其驱动力是自上而下地对政权问责，而非自下而上的选举问责。其结果是，一个“温顺但有用的议会”能够有效地传达民意，同时在事关政权存亡的核心问题上坚定地忠于党。

本章随后重申了前几章的关键实证研究结果，以佐证这一框架。关于影响力（第三章），报告指出，海南省人大随机抽取的提案中约有一半对政策结果产生了切实影响，但该数据集中未发现任何政治改革提案。反过来，中国公民也感受到了这种部分响应，他们支持受欢迎的政策，但不支持主张政治改革的政策。关于代表权（第四章），研究发现，公开的全国人大代表提案在非敏感问题上与省级选民的意見一致，并且在舆情冲击后观察到立法回应，但同样，在政权认为敏感的问题上没有回应。在选拔方面（第五章），连任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公开提案数量明显更多（多出 20-50%），这表明立法活动与职业发展相关，每增加一项提案，连任的概率就会增加约 2%。最后，关于租金（第六章），CEO 获得全国人大代表资格的公司，其回报率提高了 1.5-2 个百分点，营业利润率提高了 3-4 个百分点，股价也上涨了 3-4 元人民币。**这些综合研究结果颠覆了普遍存在的“橡皮图章”式认知，凸显了全国人大作为“具有政治影响力的代表机构”的作用，在民众预期不断上升的情况下，它帮助中共维持控制。**然而，本章也警告称，人大代表仍然对党负责，而不是对人民负责，而且在与政权利益相冲突的问题上，人大代表的真正代表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缺失的。

本章“超越全国人大”，探讨“界定代表权”框架在其他威权主义情境中的普遍性。它承认，全国人大的作用经历了历史性的演变，从毛泽东时代被边缘化的“橡皮图章”，到邓小平时代焕发活力、如今已成为成熟且有约束力的机构。该框架拟适用于符合四个关键范围条件的威权政体：拥有议会、不允许真正的反对党存在、资源不丰富以及福利/教育达到基准水平。古巴、斯威士兰、越南和老挝在 2008 年被认定为符合这些条件的国家，因此它们“最有可能”出现类似的议会机制。本章随后详细介绍了越南国民议会（VNA）的显著相似之处：与全国人大一样，越南国民议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但隶属于越南共产党。越南通讯社利用“质询会”进行信息披露，代表们回应选民对非约束性问题的关切，并表现出循规蹈矩的行为，依靠封闭政治体系中的绩效合法性。古巴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NAPP）也被描绘成一个类似的社会主义代表机构，其特点是全票通过，体现了党的控制；通过提名进行的非竞争性选举；以及一个在人口统计学上具有代表性但政治上忠诚的代表。NAPP 发挥着咨询作用，代表们提供反馈并进行调查，但存在严格的界限，异议可能会受到惩罚。本文简要讨论了俄罗斯和埃及等其他案例，并指出这些国家对反对党或资源财富

的包容可能导致不同的议会动态^[9]。本章最后提倡对威权主义代表制进行进一步的微观比较研究。

最后，在“展望未来”一章中，本章探讨了中国“界内代表制”制度的可持续性。它承认，关于中国“即将崩溃”的预测一直被证明是错误的，并指出中国在高发展水平下没有进行实质性政治改革的异常地位，这与大多数高收入威权主义政权形成了鲜明对比，新加坡是主要的例外。尽管存在潜在的社会期望偏差，但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民意数据显示，民众对中国政府的信任度非常高，在受访国家中，只有越南可以与之媲美。基于此，本章对全国人大的未来提出了四点预测。首先，正在进行的反腐运动通过减少租金分配，可能会削弱代表的忠诚度，这需要中共加强其他忠诚度培养方法（例如 9 号文件等意识形态宣言）。其次，中共不太可能扭转全国人大日益增强的作用；自邓小平改革以来，人大代表制的代表性和响应能力不断增强，扭转这些有限的改革可能会面临公民日益增长的期望带来的“强烈反弹”。第三，如果没有广泛的公民集体行动，全国人大在短期内不太可能进行有意义的民主改革。当局对选举和提名保持着严格的控制，目前的领导层由强硬派主导，他们优先考虑意识形态凝聚力而非根本的政治自由化。第四个预测与第三个预测隐含地联系在一起，表明如果发生广泛的公民集体行动，全国人大代表确实可以发挥关键作用。本章最后重申，中国的威权统治者一贯通过加强全国人大以培养某些类型的代表来应对感知到的威胁，同时又通过约束代表以灌输忠诚度，从而形成了目前这种受到限制的制度。

^[9] 这些均可以成为比较的对象。